

明代文言小说《斩蛟记》作者考*

万晴川

内容摘要:孟森断定《斩蛟记》为陈继儒作,至今袭为定论。但孟文所引材料没有任何明确证据可以证明《斩蛟记》不是袁了凡作,而是陈继儒作,孟文中所说的袁了凡头巾气重、王衡对了凡不满等,皆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孟文漏引了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条重要材料,这条材料恰恰有力证明了袁了凡是《斩蛟记》的作者。

关键词:《斩蛟记》 作者 袁了凡 陈继儒

明代文言小说《斩蛟记》以朝鲜“壬辰倭乱”为背景,写日本关白(大将军)平秀吉非人类,乃许真君当年斩蛟时从蛟腹中逸出的小蛟,它逃至日本,害人无数,历一千二百馀年后,化为平秀吉等人。平秀吉杀死旧关白,夺其位,统一日本。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遣将率兵二十馀万侵略朝鲜。朝鲜向明廷告急,万历帝命宋应昌为经略、袁黄和刘黄裳为赞画援朝。袁黄在祖师和黄石公、徐茂公、丘长春等众神仙及师兄程洞真、许道源、张英接等人的帮助下,抓住蛟精嗜啖鹅的特点,购鹅三千六百只,放置海滨,诱使平秀吉现出原形,众神仙斩之。大功告成后,袁黄辞官回国,求仙访道。

袁黄(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万历十四年(1686)进士,万历二十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朝廷大举东征,经略宋应昌疏请袁黄到军营赞划。次年,因与提督李如松互讼,罢归家居,闭户著书。

《斩蛟记》最早收于陈继儒《眉公秘籍》,后有眉公跋语云:“右《斩蛟记》,或云是了凡作,或云他作以窘袁者,姑记之以资嗟噓。”^①可见陈继儒也没有确定《斩蛟记》的作者,但孟森先生却臆断说:“据眉公言,似是明万历末流行之小说。但其托之于了凡自撰,即眉公亦不敢质言。以今考之,此即眉公所以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教图像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研究”(批准号15BZW106)成果之一。

①转引自孟森:《袁了凡斩蛟记考》,《心史丛刊二集》,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191页。

嘲了凡者也。了凡头巾气甚重,应为眉公辈所讪笑。”^①然后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王衡《与了凡主政书》、钱谦益《初学集·东征二士录》等资料,判断《斩蛟记》为陈继儒所作。孟森先生的观点迄今成为定论,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三《斩蛟记第二十三》、薛洪绩、王汝梅主编《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集》等,皆袭孟说。

但笔者认为,孟先生引证的所有材料都无法证明陈继儒是《斩蛟记》的作者,也无法否定袁黄是《斩蛟记》的作者。现一一辨之。

其一,孟森先生说,陈继儒作《斩蛟记》嘲笑袁了凡,是因为他“头巾气甚重”。这其实是误解,袁了凡信奉阳明“心学”,不是程朱信徒。他的父亲袁坡就是阳明弟子,与王畿是好友。袁黄师事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王畿,受到他们赏识。他自己编纂的举业用书《四书便览》、《书经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并在《与邓长洲》中批评“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还将王衡讽刺朱熹“理欲知行动辄分为两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夹断”的话编入《游艺塾续文规》中^②。后来袁黄的友人将《四书便览》、《书经详节》改名为《四书删正》、《书经删正》出版,结果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礼部郎中蔡献臣“取其书细加翻阅”,见袁黄“将朱注尽行删削,甚至并其注而僭改之,中间异说破辞又多与紫阳抵牾者”,因此要求各地提学官将《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等书“原版尽行烧毁,其刊刻鬻卖书贾一并治罪,仍严谕书童不得为其所祸,藏留传诵”^③。朝鲜自李朝一直以来师从大明,意识形态上一直是朱子学的天下。而宋应昌、袁黄等人都是王阳明的信徒,特别是宋、袁有师生之谊,他们首次将王学传播到朝鲜。朝鲜《宣祖实录》记载二十六年(1576)三月朝鲜国王与大臣尹斗寿谈到“袁主事非朱子之学而宗阳明”^④。

其二,孟先生认为王衡给袁黄的信中露出对他的不满,“此亦见《斩蛟记》之必出于眉公辈轻薄之笔矣”^⑤。但笔者认为《袁了凡主政》并没有流露出对了凡不满的意思,现全文移录如下:

捧读尊函,先生赠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极感极感!惟是居尘出尘即事炼心之道,固衡所稔闻也。明知情有所著,蓬官瑶池与厕溷原无二相。而根性顽犷,习与性成,如餐雪蛆,作蓼虫,焦闷且死。接客未数语,而背如猬刺;读书未数行,而急欲完卷。嵇中散、陶元亮之乐更无有,而所云

①孟森:《袁了凡斩蛟记考》,第194页。

②袁黄:《与邓长洲》,《游艺塾续文规》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7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9-200页。

③蔡献臣:《烧毁四书书经删正等书札各提学》,《清白堂稿》卷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④《宣祖实录》卷三六,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本,第510页。

⑤孟森:《袁了凡斩蛟记考》,第195页。

懒着衣冠,读书不尽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对真人前不说假话,姑俟琢磨客气几分,乃敢称先生弟子耳。^①

信中王衡感激袁黄教自己修道,但自称“生性顽犷”,待以后稍有寸进,再拜了凡为师。

王衡(1562-1609),字辰玉,号猴山,内阁首辅王锡爵之子。少负异才,能诗善书,名动海内。万历十六年(1588)举顺天乡试第一,王衡作为宰辅之子,有人无端猜忌他作弊,此后他连续三次不参加会试。万历二十九年始举进士廷试第二人,此时王锡爵罢相已久。王衡授翰林院编修,旋即辞归,与父一起隐居故里。王锡爵一家,受佛、道影响巨大。王锡爵次女王桂(1558-1580)字焘贞,未嫁夫死,居家守贞修道,声称受仙人指点,自号“昙阳子”。远近传说有灵气,一时名士竞相膜拜,敬奉如同女仙。投入昙阳门下的,除了她自己的父亲和叔父外,还有当时的一些大名士如王世贞、屠隆、沈懋学、王敬美、冯梦龙等。万历八年(1580)九月九日昙阳子白日飞升,赶来目睹盛事的有十万之众。万历九年三月,户科给事中牛惟炳、云南道御史孙承南参劾王锡爵、王世贞溺于神怪,谓昙阳子死后,“男妇呼号罗拜者约十万人,与民间相率而进香龕下者尚中夜不绝”^②。昙阳子羽化后,王世贞仿《南岳魏夫人传》作《昙阳大师传》,当时包括徐渭在内的很多著名文人都为她作过传记。从王衡的书信看来,袁黄也信仰道教。他有个学生洪自诚,四川新都人,别号“还初道人”,编有《绘像列仙传》,请袁黄为之题词,袁黄署名为了“了凡道人”,题词中自称“予性寡谐,谢绝一切世氛,独紫芝白石有夙癖焉……他日倘逸樊笼而步碧虚,请执是以作玉杵,或不谓无因云”^③。王衡是个大孝子,他不可能不受到佛、道的影响。他因举业不顺,壮志难酬,有强烈的隐居修道思想,曾自称“前身是居士,生长宰官家”(《自叹》(其一)，“少有嵇中公癖,那堪与世亲”(其三)^④。王锡爵在给袁了凡的书信中,曾提到:“儿衡之别也,作游仙词数阙见调,以道人不了之义而生,又可强之应试乎?”^⑤可见王衡在乡试中遭到打击后,浸染仙道。王锡爵又在给袁了凡的另一封信中说:“仙踪正向何所得教,恍然身在华胥,梦中忘我,且忘世矣。”^⑥可见王锡爵父子都受到道教的影响,王衡不可能嘲笑袁黄建议他

①王衡:《猴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99-200页。

②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七十八《昙阳大师传》,转引自徐朔方:《王世贞年谱》,《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53页。

③《列仙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前面《仙引》。

④王衡:《猴山先生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98页。

⑤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之二十一《袁了凡主事》,《四库禁毁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60页。

⑥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之二十四《袁了凡主事》,第536页。

修道的善意。其实从袁黄在《游艺塾续文规》中引用王衡讽刺朱熹的话看来，他俩的关系应该不错。

其三，孟先生推测“必其时了凡于倭事独持异说，为时所讶，因作《斩蛟记》以腾笑耳”^①。但从现存资料看来，袁黄于倭事并无异说，只是当时在援朝将士中存在南人和北人、文人和武人之争，经略宋应昌是浙江杭州人，袁黄当然站在他一边。他在援朝战争中立下战功，强烈反对李如松及其部下割朝鲜人首级冒功的行为。天启元年（1621）吏部追叙袁黄“东征”功勋，赠尚宝司少卿。无名氏传奇《立命说》专门渲染他的战绩。钱谦益的《东征二士录》描写了由袁黄推荐的二个奇士在援朝抗倭中的战功以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该文无任何证据否定袁黄是《斩蛟记》的作者，相反，恰恰从侧面赞美了袁黄的识人之才。

其四，最遗憾的是，孟文没有引用一条最重要的材料，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斩蛟记》：

关白之犯朝鲜，朝议倾国救之。时宋桐冈（应昌）以少司马督师专征。宋无阍望，能大言，次年将内计，有物色之者，因力任东事，大司马石东泉主之，内阁则赵兰溪暂代首揆，唯石是听。特遣二主事赞画，皆妙选才望，赐四品服以往，宋亦加服一品，得僭副帅以下，事权特重。后碧蹄馆败归，师遂不振。次年癸巳，一赞画者以拾遗论罢。其人故耆凤名士，为太仓相公门人，号相知，意其能援手。时竞传关白已死，遂作一书，名《斩蛟记》。首云关白平秀吉者，非人亦非妖，盖蛟也。漏刃于旌阳，化成此酋，素嗜鹅。在朝鲜时，曾谋放万鹅于海中。关白恣啖，因得剗刃。而主之者，昙阳大师也。《记》出，远近骇怪，其同邑先达遂作《辟蛟记》诋之，以快宿隙。究之，关白实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而太仓相公曾见此记与否，皆未可知也。

斩蛟之记亦有所本。潘玺卿雪松（士藻），冯司成癸未所录士，滞符台十年，在京偕诸名士立讲会，每云吴猛镇铁柱宫，实多遁去者。许真君约后千年，当生八百散仙，馘此孽魔，今正其时矣。我为一人，与某某等皆同列，余师司城公，亦其一也。京师信之，竟求附仙籍。潘一同年素不预讲，亦遥隶群真，起大宅将王公，云拔宅上升时，勿令资产有所遗。司成见而讪笑之。又袁中郎为吴令时，与彼中一名公交厚。名公素以圣人自命者，每论事，辄云如来如此说，大士与我商略，亦如此说。其他称引果位不胜纪，袁谈及必抚掌不已。又屠纬真在湖上，一日忽对余曰：“昨日吾解一大纷，关壮缪、苏文忠各来枉顾。二人素未识面，偶苏举曹刘并称。壮缪震怒，谓小子何敢辱吾兄，至与阿瞞伍。苏争之，甚不服，两相搏，搆斗不休。若非余力解，则东坡饱老拳矣。”屠为予父执，第俯首匿笑，不敢对。大抵才士失职，往往故为夸诞，以发舒胸中磊块，不足信，亦不足哂也。^②

^①孟森：《袁了凡斩蛟记考》，第196页。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斩蛟记》，第442-443页。

1. “一赞画者以拾遗论罢。其人故耆凤名士,为太仓相公门人,号相知,意其能援手。”这里明确指出《斩蛟记》的作者是袁黄。袁黄聪颖敏悟,卓有异才,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家之一,对天文、术数、水利、兵书、政事、医药等无不精通。万历丁丑会试,房考陈三谟拟本房第一,后以“五策不合式下第”,堪称“耆凤名士”。万历二十年八月,朝廷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事宜,以主事袁黄随行赞画。次年三月,拾遗疏劾他在宝坻任知县时纵民逋税,革职归。

“太仓相公”指王锡爵(1534-1614)字符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人。袁黄原籍浙江嘉善,其高祖因靖难之役出逃,定居江苏吴江。吴江和太仓都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隆庆三年(1569),袁黄至南京国子监读书,而此时王锡爵任南京国子监司业。万历十四年袁黄考中进士,而此时王锡爵为会试主考官。因而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从现在所见资料看,两人有密切的交往,袁黄曾代王锡爵作过寿序,《袁了凡文集》今存了凡写给“王荆石座师”的书信四封,而《王文肃公文集》也留有王锡爵给袁了凡的信四函。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为内阁首辅,袁黄被人参劾,希望王锡爵出手相救。

2. “时竞传关白已死,遂作一书,名《斩蛟记》”,“而主之者,昙阳大师也”。这里说推动袁黄撰《斩蛟记》的是“昙阳大师”。从昙阳子的思想看来极有可能,她宣扬“儒释道一体”,尤重神仙思想,崇拜许真君,以许真君为祖师的净明道,也主张三教合一。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龙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滨,白沙涌起,堆阜高峻,其形如龙,俗为重九登高处。旧有谶云:“龙沙高过城,江南出圣人。”今沙过城十馀年矣。昔许旌阳斩蛟,蛟子逸去,散游鄱湖,弟子请悉诛之,旌阳曰:“吾去后一千一百二十年,岁在三丙,五陵之内,当有八百地仙出,自能诛之,毋劳今日尽也。”今正当三丙间,去其岁不及二十年,又有龙沙之应。昙阳子记亦云:“五陵为教主,古月一孤峰。”意其所谓圣人者,神仙之流与。^①

上引内容和沈德符《斩蛟记》末段,都说明了袁黄《斩蛟记》小说创作的本事依据。

3. “远近骇怪,其同邑先达,遂作《辟蛟记》诋之,以快宿隙。究之,关白实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由此看来,嘲笑袁黄的应该是另一部小说《辟蛟记》而不是《斩蛟记》,而且它的作者是袁黄的同乡。

其五,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其父沈自邠系万历五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编修《大明会典》。沈德符受父亲影响,自幼喜闻朝野故事,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于时事和朝章典故。沈德符十二岁时父亲辞世,乃随母回乡。沈德符和袁黄是正宗老乡,又是同时代的人,不排除两人有交集的可能,作为史学家的沈德符,他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

^①王士性:《广志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1册,第754页。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与王锡爵有深交,万历十年十一月曾寓居王家,与王衡一起读书。陈继儒与王氏父子结下深厚的友谊,以父事王锡爵,以兄事王衡。王衡、王锡爵歿后,陈继儒照顾王衡之子王时敏,视如己出。袁黄是王锡爵的学生,而且与王家关系密切。与袁黄一样,陈继儒本人也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他与袁黄很可能也多有交往。尤其重要的是,当时作为最高军事指挥的李如松有意压制南方军队,抹杀他们的功劳,南方文武官员皆为之愤愤不平,作为统帅的宋应昌尽管心里也不满,但必须协调各方的关系。他在与袁黄的书信中,一方面对他“忽遭含沙”表示同情,但又反复叮嘱他要“委屈遇之”,“安心所事,益展弘猷”,并要他“私以鄙意”转达给南方军队将领吴惟忠,要他抛却私怨,“努力建功”^①。王锡爵、陈继儒都是南方系的重要成员,所以,陈继儒不太可能冒用袁黄之名写《斩蛟记》以讥刺袁黄,这有损他的声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袁黄作为《斩蛟记》的作者不容置疑。

【作者简介】万晴川,原名万润保,文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①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五、卷六,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27、488页。